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09
(第8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8)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地域选择及其集聚效应研究
——以河南11村的调查为例

张建杰[a,b]

(河南财经学院:a. 农林经济管理系;b. 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11)

摘 要:根据对河南11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的调研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就业主动融入分工经济,其地域选择倾向于"省外"多于"省内",但"省外"分布不均,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省内"则主要集中于"县外市内",且随转移半径的增加,劳动力的性别、婚姻、年龄、文化程度、社会关系网络、劳均耕地、所处区位及其分工参与度等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程度总体减弱。同时,劳动力外出就业趋同产生的就业集聚效应显著,劳务收入明显提高,但以自组织途径为主的转移模式难以改变其职业层次偏低和"城市边缘人"身份等窘境。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地域选择;集聚效应;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9)04-0001-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常态性或持久性的研究课题,因而该问题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纵观现有文献,其研究较多将移入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与收入预期作为拉力因素,将移出地的产业劣势与低收入作为推力因素[1-2],而较少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置于潜在机会与预期收入条件下,研究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融入意愿与行为选择,以及转移就业与其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间的动态关联效应。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在进行转移决策时是受到一系列由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制度选择集约束[3]。在此情形下,劳动力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选择,即具有不同的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劳动力在决策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倾向。不难发现,预期收入与转移成本之比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而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的示范效应、决策关联及其就业集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其成本收益预期。在此认识下,本研究以劳务输出大省河南为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地域选择倾向及其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借鉴。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下的中部农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此次调研地点选取了欠发达地区河南省,本着考虑地形、交通通达性、土地类型和经济水平四个因素,选取了11个代表性村庄(表1),在每个村庄随机抽查农户

收稿日期:2009-09-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5350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JY6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9FJJ030);河南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项目(092400440073);2009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B105)

作者简介:张建杰(1969—),男,汉族,山西五台人,河南财经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户经济.

100 – 130 户,最后共形成有效调查问卷 1251 份。

表 1 河南省分层抽样结果

类别	乡镇数/个	随机抽样乡镇	调查村
平原中等通达旱地水浇地高收入农区	226	漯河市郾城县阴阳赵乡	阴西村
丘陵中等通达旱地水浇地低收入农区	57	南阳市方城县清河乡	余庄村
丘陵中等通达旱地水浇地中等收入农区	80	安阳市安阳县蒋村乡	石棺村
平原城郊旱地水浇地高收入农区	136	焦作市山阳区恩村镇	墙南村
丘陵中等通达水田中等收入农区	36	信阳市潢川县彭家店	陈湾村
山地偏远园林草地低收入农区	48	三门峡市卢氏县瓦窑沟乡	上河村
平原中等通达旱地水浇地低收入农区	209	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乡	阎洼村
平原偏远旱地水浇地中等收入农区	75	周口市鹿邑县辛集镇	董楼村
平原城郊旱地水浇地中等收入农区	96	驻马店市新蔡县十里铺乡	祖岗村
平原中等通达旱地水浇地中等收入农区	554	濮阳市台前县后方乡	大寺郭村
平原偏远旱地水浇地低收入农区	45	开封市兰考县孟寨乡	北宋村

(二)模型建立

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进行常规梳理,并结合问卷调查资料,本文拟采用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即多元选择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模型中,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概率 P_i 作为被解释变量(经过数学变化后为转移就业的发生率),其四种就业选择记作:乡外县内为 1,县外市内为 2、市外省内为 3、省外为 4(其中省外转移就业作为对照组);把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区位因素、制度因素以及专业化分工程度等作为解释变量,分别是:采用劳动力的性别 X_i、年龄 A_i、婚否 M_i 及受教育程度 S_i 反映劳动力的人口特征;劳均耕地面积 L_i、家庭年收入对数值 $\ln I_i$ 反映劳动力的家庭经济特征;地貌特征 T_i、通达性 J_i 反映劳动力所在地的区位特征;劳动力外出的组织化程度 O_i(即为通过政府途径或市场中介实现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占转移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来反映其制度因素;劳动力外出就业时间占比 W_i(外出就业天数/365)以及农户家庭社会资本指数 C_i(以社会交往费用与话费之和占总收入比重,除以总体平均水平来表示)表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专业化与优势化程度,这两个指标既反映其主动融入分工协作经济的初始抉择,也体现其从事专业化工作或操作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的增进,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一定的影响[4]。据此,建立农村劳动力外出地域选择的计量分析模型如下:

$$\ln\left[\frac{P(y=i)}{P(y=j)}\right]=\alpha_{i0}+\beta_{i1}X_i+\beta_{i2}M_i+\beta_{i3}A_i+\beta_{i41}S_{i1}+\beta_{i42}S_{i2}+\beta_{i43}S_{i3}+\beta_{i44}S_{i4}+\beta_{i5}L_i+\beta_{i6}\ln I_i+$$

$$\beta_{i71}T_{i1}+\beta_{i72}T_{i2}+\beta_{i8}J_i+\beta_{i9}O_i+\beta_{i10}W_i+\beta_{i11}C_i+u_i \qquad (i=1,2,3;j=4)$$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地域选择的模型分析

运用上述确定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2。从表中看出,各影响因素对“乡外县内”劳动力转移的解释力较强,而后依次是“县外市内”及“市外省内”。这表明,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范围的扩大,其影响因素也会随之变得更为复杂。

对于“乡外县内”劳动力转移而言,家庭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区位因素对其转移就业发生率的作用显著。其中,女性劳动力、年龄较长者、小学文化程度者、家庭收入水平较高者、地处平原与丘陵者、通达性欠佳者、转移时间占比较高者、社会资本指数较高者更易于实现“乡外县内”就业,而未婚者、非小学文化程度者以及劳均耕地面积较大者则对其转移就业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已婚、年长以及学历较低者迫于家庭负担、就业适应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等缘

故，倾向于在本县域范围内实现转移就业；未婚、年轻、学历较高的劳动力适应能力较强且家庭负担较轻，一般不倾向于在本县就业，而希望跨区域就业，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再从专业化分工视角来看，区位条件较好地区非农产业较为发达，农户家庭非农经营或非农就业的机会相对较多，实现就近转移就业的可能性也较大。同时，由于“离土不离乡”式的转移就业并未完全非农化，务工往往不弃农耕，具有典型的兼业特性，因而，较多的劳均耕地对其在本县域范围内的转移就业是一种阻滞作用，并且其作用程度远远超过对异地转移就业的影响。转移时间占比对本县域内劳动力转移的正向作用极为显著，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却较为有限。

表 2　劳动力转移就业地域选择的 Logistic 模型参数估计

解释变量		乡外县内	县外市内	市外省内
α_0	截距	-1.717***	-3.315**	-1.916*
X_i	性别(男性为对照组)	0.433*	0.442	0.060**
A_i	年龄	0.018*	0.179*	0.024
M_i	婚否(已婚为对照组)	-0.515	-2.867	-1.221
	学历(大专及以上为对照组)			
S_{i1}	文盲	-0.294	-1.785	-0.605**
S_{i2}	小学	0.488	-0.947*	-0.423*
S_{i3}	初中	-0.455	-1.338*	-0.873*
S_{i4}	高中及中专	-1.816	-2.547	-1.376
L_i	劳均耕地面积	-0.623***	-0.231**	-0.247*
$\ln I_i$	收入对数值	0.243**	0.227**	0.173*
	地貌(山地为对照组)			
T_{i1}	平原	0.029*	1.121	-0.123
T_{i2}	丘陵	2.048*	1.744*	-0.312
J_i	通达性(通达为对照组)	0.130*	-0.300	-0.179*
O_i	组织化就业(正规组织途径为对照组)	2.016	0.301	2.069
W_i	转移时间占比	1.833**	1.114*	0.515*
C_i	农户社会资本指数	0.066	0.190*	0.136*
	Nagelkerke R^2		0.513	
	-2Log Likelihood		1041.037***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对于“县外市内”劳动力转移来说，年龄、收入、地貌、转移时间占比及社会资本对其转移发生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已婚、学历、劳均耕地面积及通达性均为负向影响。可见，随着转移距离的增加，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些正向因素变成了负向作用。从其看出：农村劳动力在本县域外就业，不仅要克服空间距离增加所带来的交通费用负担，而且还需化解人文风俗差异所引致的心理成本或效用损失，必然会对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提出更高的要求。与“乡外县内”相比，转移就业时间占比对“县外市内”转移就业的影响虽仍是正向作用，但强度在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在本县域内通过非农转移与县域外的转移就业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5]，若在本区域内业已实现较高的专业化分工参与度，则会减少甚至不予考虑跨区域转移就业。

就“市外省内”劳动力转移而言，发挥正向作用的仅有性别(女性)、年龄、收入、转移时间占比因素，其余皆为负向作用。其中，性别(女性)、收入、转移时间占比在保持正向作用的同时，其作用程度较就近转移而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而婚否、学历、劳均耕地面积的负向作用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弱。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地貌、通达性等区位因素的影响由正变负，而农户家庭社会资本指数的正向作用得以提升。可见，在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专业化分

工参与以及经济收入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劳动力输出地的区位条件及其社会资本的作用显现。

总体而言,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其家庭农地经营规模的制约;二是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呈现先增后减的"∩"形变化趋势;三是组织化就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其主动融入分工经济中的专业化经营决策行为。可见,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就业主动融入分工经济,必然带来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应变化,并且在外出就业的地域选择上趋同而产生就业集聚现象。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集聚效应

(一)转移劳动力集聚度估计

为了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集聚程度,在此,引入就业集聚度(DALC)指标,其反映劳动力转移就业中的地区集聚程度及倾向性。DALC 可以表示为:

$$DALC = (\frac{1}{2} - S_{DL}) / \frac{1}{2} \tag{1}$$

式中,S_{DL}又可表示为:

$$S_{DL} = \int_0^1 AL(i)\,di, i \in [0,1], i \to 0 \tag{2}$$

其中,$AL(i)$为按照第 i 地区劳动力流入数占总体劳动力流动数的比例从小到大排列的比例数,i 为对应的依次排列的地区,这里的 i 可无限细分[①];S_{DL}表示 AL 曲线的积分面积。DALC 值越接近1,则表明集聚程度越大;反之,越接近于0,则集聚程度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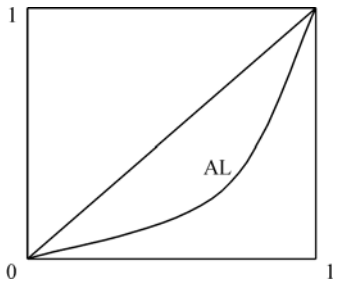


图1 集聚度示意图

将 AL_i 看作指数函数,即 $AL_i = ae^{bx}$,并通过曲线模拟,得出以下参数值:

$$a = 0.068, b = 0.268$$

代入(2)式可得:

$$S_{DL} = \frac{0.068}{0.268} e^{0.268x} \Big|_0^1 = 0.254 \times (1.307 - 1) = 0.078$$

代入(1)式可得:

$$DALC = \left(\frac{1}{2} - 0.078\right) / \frac{1}{2} = 0.844$$

① 这里的"i"指的是劳动力流入数占总体劳动力流动数的比例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列的、有劳动力流入的任一地区(本文是以省为地区基本单位来计算的);劳动流动数的数据是依据调查结果,通过多重交叉分组而来。先计算每个省的劳动力流入数,而后计算占总外出务工人数的比重,再按照其比例由小到大排列,模拟其比例走势的线性模型(为指数模型),计算积分比例面积,即可计算出就业集聚度的具体数值。

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显著的就业集聚趋势。上述趋势的形成，一方面是劳动力微观决策适应制度环境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就业集聚过程中形成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变化又会强化这一趋势。

（二）转移劳动力的区域集聚

农村劳动力就业集聚的总体趋势明显，那么其区域集聚度如何呢？为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各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职工平均工资所得的数据，由高到低将其分为三类，职工年平均工资高于28000元的为发达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介于22000－28000元的为中等发达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低于22000元的为欠发达地区。从表 3 来看，农村劳动力在本省内实现转移就业的比重最高，占到转移劳动力总数的 37.82%，居其次的是广东，占到转移劳动力总数的 19.77%（在出省转移劳动力中的比重高达 49.46%），而后分别是发达地区、中等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周边省份及其他省份。若不考虑在本地区转移就业，则有随经济发达程度提高，劳动力转移规模递增的趋势。调查显示：在出省转移劳动力中，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以及发达地区的比重分别为 9.91%、25.81%、64.29%。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地区的产业集聚度较高，市场规模较大，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也相对较多。

表 3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区域集聚

发达地区	人数	中等发达地区	人数	欠发达地区	人数
北京	51	辽宁	6	河南	264
天津	15	江苏	13	山西	15
上海	41	福建	10	新疆	8
浙江	34	山东	81	河北	5
广东	138	重庆	1	湖南	5
		青海	1	陕西	4
				内蒙古	2
				四川	2
				其他	2
总体	279	总体	112	总体	307

（三）转移劳动力集聚的职业层次

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地域倾向性与就业集聚特征，这一趋势能否使转移劳动力在职业层次上出现一些变化呢？从表 4 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层次总体偏低，绝大多数劳动力为一线职工，不足 4% 的职工为班组长及以上职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转移范围的扩大，该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其中，实现县外转移就业的劳动力，班组长及以上职位的比重有所增加，但仍然没有改变其以一线职工为主体的基本特征。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虽能够带来其就业机会、生活环境、发展机遇的某种改善，但仍处于劣势状况，尤其难以改变其“城市边缘人”的身份特征。

表 4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集聚的职业层次

地域分布	就业层次（%）				
	一线职工	班组长	部门经理	高层管理	总体
乡外县内	5.87	0.14	–	–	6.02
县外市内	24.93	0.43	0.43	–	25.79
市外省内	6.16	0.14	0.43	–	6.73
省外	59.60	0.86	0.86	0.14	61.46
总体	96.56	1.58	1.72	0.14	100.00

(四)转移劳动力就业集聚的方式及收入效应

从表5来看,农村劳动力自身能力在其转移就业中的作用随距离增加而作用递减,即自身能力主要在本区域(乡、县、市)范围内发挥作用,若超过本省范围,劳动力自身能力的作用就会大为降低。与此对照,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关系在其转移就业中发挥的作用较大,且随转移距离的增加而渐次递增,尤其是县外转移就业者,通过社会关系资源实现转移就业的农户比重均超过了50%。就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配置而言,年外出打工时间接近或高于9个月,并且外出就业的劳动时间占比平均为77%,其中在本县域内转移就业者的比值更高。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伴随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劳动力要素的专业化配置及其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

表5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集聚方式与收入效应

就业地	转移就业方式/%				劳动时间配置		月工资
	社会关系	正规组织	自找门路	其他	年内打工时间/月	转移时间占比/%	/元
乡外县内	43.90	–	53.66	2.44	10.19	85	809.52
县外市内	52.20	3.77	42.77	5.03	9.22	77	780.61
市外省内	58.70	–	39.13	2.17	8.56	71	1068.09
省外	64.51	0.24	4.64	30.85	9.19	77	1043.72
总体平均	53.12	2.83	35.86	8.19	9.20	77	960.17

随着外出劳动力转移半径的延伸,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中,在“乡外县内”及“县外市内”的月工资收入远低于总体平均月工资,而实现“市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就业的劳动力月工资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较本县乡范围内的转移就业增加200余元。这对于月工资水平原本不高的农村劳动力而言,确实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观。调查还显示,实现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月工资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增趋势,分别为871.65元、971.89元、1058.64元。可见,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转移能够带来其劳务收入的较大提升。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自身因素与制度环境条件的双层约束。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不仅为其融入分工经济的主动性选择,同时也是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动态变化的一致性反映。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有:

(1)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建立在家庭成员内部分工基础上的兼业化行为。家庭核心劳动力通过外出就业实现最大化的劳动要素收益,而非核心劳动力从事农地经营获得较为稳定的保障性收入。核心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地域选择倾向于“省外”多于“省内”,但“省外”分布不均,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省内”则主要集中于“县外市内”,而后依次为“市外省内”及“乡外县内”。

(2)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对其区位条件的适应性反应。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农民就业机会缺乏,劳动要素收益偏低,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外出就业。通过外出就业(而非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决策)融入发达地区,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要素收益最大化,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甚至逆转其生存困境。

(3)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选择。计量结果显示,仅以学历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明显,但存在显著影响的反映劳动力专业化分工参与度的转移时间占比,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通过“干中学”模式实现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其的影响力。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主渠道作用,不仅能够在微观意义上实现农村劳动力(团队性)专用性人力资本水平的增进、市场谈判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资本构成的优化,而且在宏观意义上有利于

实现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

(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集聚效应明显。不仅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集聚度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在就业集聚区能够实现较高的劳务收入。不过,外出劳动力在劳务收益有所改观的同时,以自组织途径为主的转移就业模式难以改变其职业层次偏低的窘境,这表明规模化程度不高、以社会资本为纽带的农村劳动力组织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为此亟需采取:(1)在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分业分流;(2)构建政府职能部门为主导、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教育培训、信息咨询、跟踪服务等项目服务机构[6],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3)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制度环境,重点完善农民工用工合同制度;(4)全面推行农民工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在切实维护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其经济利益、职业身份及社会地位的同步改善与提高。

参考文献:

[1] 戎　建. 迁移回报率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J]. 中国农村经济,2008,(11):27.
[2] 张世伟,郭凤鸣. 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问题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9,(2):35.
[3] 单正丰,李　文,陈如东. 农村劳动力迁移中的两级遴选机制与群体分化[J]. 农业经济问题,2009,(6):57.
[4] 乐君杰. 农村劳动力收入与就业时间的决定及性别差异[J]. 中国农村经济,2008,(11):36.
[5] 胡　枫.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 浙江社会科学,2007,(1):207 - 208.
[6] 杨晓军,陈　浩. 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8,(11):46.

Study on Rural Labors' Terrain Choice and Its Centralizing Effect in Their Migration to Take up an Occupation ——Based on Survey of Ten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ZHANG Jian-jie[a,b]

(*a. Department of Economical Management 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450011, *China*)

Abstract: The computation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 that: rural labors participate in division of labor initiatively by migration to take up an occupation; they prefer to migrate to outer provinces than to inner provinces. However, rural labors distributing in outer province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mainly concentrated in developed areas; rural labors migrated to inner provinc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region from outer county to inner city where they live, with the migrating distance increasing, the factors, such as rural labors' sex, marriage, age, degree of education, social connection, plow land per labor managed, area condition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division of labor, exert a decreasing effect on influencing their migration to take up an occupation. In the meanwhile, rural labors' migration causes centralizing effect markedly, also increasas their income from service, yet their self-organized mode hardly change over the quandary of low employment level and marginal status to city where their migrate to take up an occupation.

Key Words: rural labors; migration to take up an occupation; terrain choice; centralizing effect; Henan Province